

941642



戴安娜的真实故事

(英) 安德鲁·莫顿 著
汤玉明 相艳 李长安 译

● 西 北 大 学 出 版 社 ●

目 录

第一章	这仅仅是开始	1
第二章	我应该是个男孩	10
第三章	就叫我“先生”吧	38
第四章	我满怀希望	63
第五章	我呼唤帮助	78
第六章	亲爱的,我将逝去	95
第七章	我的生活改变了方向	106
第八章	我不介入他们的圈子	125
第九章	我已竭尽全力	152
附 录	查尔斯与戴安娜能否离婚?	165

第一章 这仅仅是开始

电话另一端的声音短促而洋溢着按捺不住的兴奋：“快接保密器。”这声音并非来自某一战舰的指挥室或白宫的某一间秘密办公室。保密装置只是接在普通的电话上。查尔斯王储解雇他的私人秘书、陆军少将克里斯托弗·艾雷爵士的最初的详尽消息通过电话传送过来。

电话是从欧洲西北端岛屿上的一个遭受狂风肆虐的公共电话亭打来的。这是通向君主国中心的电话线的第一站。它把英国王妃的婚姻及她在王室生活的真实情况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其揭示的事实是令人震惊的，也是颇有教益的。

十年来，我一直在观察当今君主制的运行，撰写有关王室家族的文章和书籍，并在电视和广播里举办讲座，我自以为在这方面我的知识非常渊博。直到去年我才认识到，对于白金汉宫铁门和肯辛顿宫红墙内的一切情况，我知道得甚少。

我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查尔斯王子解雇其私人秘书的报道。一周以后，我写了一篇较长的通讯，描述王子与王妃办公室之间存在的斗争。几周以后，在戴安娜王妃三十岁寿辰之际，我又写了一篇文章，报道电视新闻人物吉米·萨维尔如何调解王子与王妃之间的矛盾。外界已经知道，王妃拒绝王子为她在海格洛夫乡间别墅举行生日聚会。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这些报道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首先，它引起了王宫内部的政治迫害，以查明我的消息来源。长期的经验告诉我，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查尔斯王子的新任私人秘书理查德·阿拉德中校仔细研究我写的文章，寻找泄密的线索；女王的私人秘书罗伯特·费洛斯爵士对肯辛顿宫内人员大肆指责，兴师问罪。

长期在《太阳报》供职的摄影记者亚瑟·爱德华兹言谈举止随便，不拘小节，使人难以想象他竟然在皇家世界内部有可靠的通风报讯者。他打给我的电话却证实了上述事实。他说：“我不相信你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吉米·萨维尔调解王储夫妇矛盾的报道。后来我与我的一个熟人通了电话，他说这是真的。我这次打电话提醒你：小心点，他们正在查寻为你提供消息的人。”今年三月，我写了一篇约克公爵与约克夫人即将离婚的报道。一位可信的熟人打电话告诉我，皇室和外交保卫队的高级警官已被召进肯辛顿宫，受命查寻泄密者。“留心你的电话。”有人曾粗鲁地提醒我。十天之后，有人闯入我的办公室搜索。

同时，我的这些对王妃表示同情的文章和报道向王妃周围的人表明，王妃的故事终于有人公正报道了。王储和王妃婚礼十周年及王妃三十岁寿辰之际，纪念性的书籍和文章大都把玉

妃描述成轻薄天真的姑娘，其情感和思想受她那位思想严肃的丈夫的引导。王储夫妇的婚姻生活虽有起伏和变化，但他们仍是一对友好和睦的伴侣；虽然兴趣互不相投，但共同的职责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这是新闻界的共同看法。

然而，我很快就了解到，王妃最密切的朋友认为上述看法是对事实的歪曲。后来，大约在一个星期三，我在一个极不和谐的地方——伦敦郊外一家工人餐馆里约见了戴安娜朋友圈里的一位挚友，这次谈话是我看法上的一个转折点。周围餐桌上人们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熏肉和鸡蛋，我们在一旁侃侃而谈，谈论戴安娜王妃在肯辛顿宫内真正的生活。

在一片刀叉碗碟的碰撞声中，这位知情人士给我讲述了戴安娜在去圣保罗教堂举行婚礼前两天曾萌发过退婚的念头，其主要原因是查尔斯王子与一位名叫卡米拉·帕克-鲍尔斯的女人暗中幽会，不能忘情。此人是女王家族一位成员的妻子，在查尔斯结婚以前曾是他的女朋友。在戴安娜的心中，王储与这位女人的私情对她和丈夫的幸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婚礼前不久，她发现了查尔斯王子准备送给朋友的一个金镯子，上面刻有两个名字：“弗雷德”和“格拉迪斯”。不久，她发现了这两个名字的秘密。卡米拉生病时，查尔斯送给她一束鲜花，上面写着：献给“格拉迪斯”，“弗雷德”赠。戴安娜顿感心慌气闷，脑中一片空白。

戴安娜承认，婚礼前后是她一生中最大感困惑的时期。蜜月尚未度完，戴安娜发现丈夫的日记本里夹着两张卡米拉的玉照。在两人招待埃及总统的国宴上，戴安娜忽然发现王储戴的袖扣上刻着两个字母“C”。这是查尔斯和卡米拉二人名字的首字母，其中寓意不言自明。戴安娜无法容忍了，宴会一结束就开始质

问他。他承认，这两枚袖扣是他曾爱恋而又失去了的女人送的礼物。由此看来，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满波折与变化，直到现在两人之间仍存在着掩饰不住的怨恨。

王室生活的压抑和婚姻的不愉快使她潜在的厌食症和贪食症更为严重。在她贵为王妃的生活中，这两种疾病一直缠绕着她。不仅如此，孤独寂寞的境遇又把她推上绝望的边缘。她曾多次试图自杀，有几次并非出于真心，有几次则是诚心实意的决定。正如她本人所言，她在王室的大部分生活都笼罩在黑暗之中。

然而，在这种生活面前，戴安娜逐步适应了，并在朋友和顾问的帮助下找到了真正的自我。这是令人振奋的一面。她从一个牺牲品转变成胜利者的过程正是这本书要讨论的主题。当然，这个转变过程仍在持续。

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事件是王妃转变的催化剂。她与卡米拉正面对质、她与丈夫在瑞士克劳斯特山雪崩中的惊险经历（王储在雪崩中险些丧命）、她在诺丁汉一家医院对一位痛苦的陌生病人的安慰，以及她最终寻找治疗自己的饮食紊乱症的决定等，都对她的转变起了推动作用。1991年，她全力以赴帮助一位身患艾滋病的朋友。这不仅使她感到生活充实，有了明确的目标，而且加深了她对自己的了解。她新近留了一头短发，这是她内心变化最明显的外部表现，标志着她已从过去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感。

显然，要写一本修正英国王妃在公众心目中形象的书，材料是充足的，但要说服我的出版商迈克尔·奥马拉——一位固执己见、来自宾夕法尼亚的美国人，却是不容易的。“如果说她很痛苦，为什么她总是笑容可掬？”这位当今世界出版戴安娜故

事最多的人问道。当时英国电视台正在报道一位并不高明的骗子伪造了一本《希特勒日记》，欺骗英国和德国大小报刊以及颇负盛名的历史学家的事。奥马拉自然疑虑重重，担心我的书将是另一本不可信赖的赝品。

于是，我安排了一次聚会，邀请戴安娜朋友圈内知情人士及其他对王室兴趣浓厚的人参加。奥马拉听着我采访时的录音，读着有关材料，看着以前从未出版过的照片。录音机关掉后，他沉默良久，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说：“我们究竟怎样才能证实这一切是真实的呢？”

这是问题的关键。鉴于王室的保密禁规，大多数能够得到的材料难以得到。最后，大家达成一致意见：戴安娜故事的每一个方面必须通过进一步采访王妃的家人、朋友和顾问，得以充实和完善。我立即动手干了起来，这项工作花了我整整十个月的时间。1991年8月，一个凉爽的夏夜，我和王妃的占星术家弗利克斯·莱尔就王妃的生活和性格作了一次长谈。他预言，我的工作艰巨的，路是曲折的。他算是说对了！为了收集材料，我采访了各种各样的人，跑遍了相关的地方：戴安娜在格洛斯特郡的家、汉普郡、多塞特郡、苏格兰，甚至美国等地，我都去了。曾为我以前的著作、尤其是《肯辛顿宫与公爵夫人秘闻》一书提供过帮助的人，我再次登门采访。

英国皇室有严格的保密禁规。肯辛顿宫的达官贵人对一切有关王室成员的信息严加控制，不许泄露。在这一点上，它和一切大集团极其相同。那些在王宫门外独自采访的作家们不久就发现，采访的大门很快就闭上了，并加了门闩。

然而，一旦发出无数封恳求采访的信件后，显然会有那么一些戴安娜的“知情人士”觉得该把王妃的真情告诸天下了。他

们认为，总该有一次讲实话的机会，把王妃过去的痛苦生活和现在仍然忍受的痛苦讲述出来。一位挚友曾解释了王妃朋友圈的人决定与我合作的原因。他说：“十年来，我们看着戴安娜被毁掉，我们相互议论她，期待某一天事情会有变化，然而什么变化也没有。看着一个欢快的蜡烛逐渐被皇室生活和不幸的婚姻熄灭，我们深感痛苦。”

我和这些人的秘密合作必须尽早结束，因为王妃很有可能在这本书原定日期——9月份出版前，宣布离婚，离开王室。自戴安娜十七岁时就认识她、出身于酿酒世家的詹姆斯·古尔说：“她最近对我说，她的记事簿上7月份以后没有任何约会安排，因为她认为那时她不会呆在王宫了。”戴安娜的断言也许是为了满足一时的愿望，也许是对真正愿望的夸张，但我们不能冒险按原计划出书，遂决定出版日期提前到6月。否则，出版此书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今年3月，约克公爵夫人突然宣布离开皇室家人，所以，我们的决定不能说是草率的。

随着采访的深入，戴安娜王妃迷人的形象背后，另一个独特的形象渐渐清晰明朗了。在公众的心目中，王妃一向温文尔雅，笑容可掬，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她却是一位孤独不幸的女人，忍受着没有爱情的婚姻，遭受女王和王室成员的冷漠，常常冒犯王室的清规戒律和旨意。曾经照看过温莎公爵并定期为戴安娜进行针刺治疗的奥娜·托夫勒评论道：“她是那个体系的囚犯，就像霍兰威女监囚禁的任何女人一样。”

在肯辛顿宫她的房间里，戴安娜收集、陈列着银质照片镜框、瓷器和其它小装饰品，其中有一台用于搅碎邮件的碎纸机和一个用于私人电话的保密器。去年夏天，她请人用电子器械秘密“搜导”了她的房间，以确认是否有人装了窃听器。结果

什么也没查出来，但她内心的疑云仍未消散，连扔在纸篓的东西她都特别小心，因为在深宫高墙内，任何事、任何人都是不可相信的。

毫无疑问，她感到她已为她在王室的生活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期望有朝一日她能够在巴黎度一个周末，或者如她所言：“我能够在海滩上慢跑，而没有警察尾随身后。”在梦想与期望愈来愈强烈时，她却忍受着一个不愉快的婚姻和痛苦多于幸福的生活的折磨。尽管她现在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控制自己及自己的生活，她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定。

面对进退两难的困境，她内心一直在痛苦地斗争着。如果她与查尔斯王子离婚，她将失去她所钟爱的两个孩子，并且失去利用特殊的身份帮助别人的机会，不管是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还是艾滋病患者或者麻风病患者。如果继续留在王宫，她将陷入毫无个人幸福的婚姻和生活方式之中。正如她的密友、学生时代的同窗卡罗琳·巴塞洛缪所言：“她不是一个幸福的人，但她曾经是。我真诚地希望有一天她会找到她应该拥有的那份幸福。”王妃的地位把她与公众隔离开来，她只好从两个孩子身上寻求安慰。小王子威廉和哈里无疑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人，是她在封闭、压抑的世界里最强大的精神支柱。

像所有的父母亲一样，她爱自己的孩子，甚至有些过分溺爱。她赐给孩子的是慈爱、拥抱和亲昵。她在安顿孩子上床睡觉或梳理他们蓬乱的头发时，总要问一句：“谁最爱你们？”她对他们的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她要保证孩子不会遭受她童年时的痛苦。那时，物质生活她一概不要，而感情方面的东西她一切都要。

她曾经说：“我要平安地把他们抚养成成人，教他们不要期望

什么，期望过高，失望愈大。这一信念使我个人的生活轻松了许多。我拥抱我的孩子，晚上亲自安顿他们睡觉。我给他们的慈爱，因为它太重要了。”

虽然她知道有一天威廉王子会成为国王，但她坚信将不做王后。她心中深深的宿命感已经对她的生活产生了影响。她直觉地意识到，她将是一个独特的女人，扮演特殊的角色。她的命运促使她走上了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君主制是次要的，而精神上的追求才是至关重要的。

这条路激发了她对病人、临终的人以及精神沮丧者的同情，她竭尽全力帮助他们，为他们提供方便。精神上的追求激励着她；支撑着她度过最痛苦的时期，这尤其表现在她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帮助和同情。帮助他们成了她内心的一种召唤，成了她减轻痛苦的方式。她的弟弟查理·斯宾塞伯爵曾对我说：“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极其虔诚的基督教徒，具有真正的基督教徒应该具备的力量和令人忌妒的生活方向。明确的目的、坚强的个性和显要的地位是她乐仁好施、帮助他人的有利条件，我相信她将继续做下去。”

假若她的婚姻幸福美满，她的这些美德也许会潜伏下去，不能得到发挥。这是她生活中饶有讽刺意味的一面。她私下为死亡和不治之症患者所做的工作，使她获得了极大的充实和满足。她说：“我喜欢这项工作。我渴望做这些事，这就像饥饿的人渴望吃饭一样。”

在过去的十年中，她遭受了许多痛苦，但痛苦的经历磨就出她坚韧不拔的精神。在生活历程的下一阶段，她必须凭借这一精神承担感情上的负担，正如今年她访问罗马时修道院院长特里萨对她所说的那样：“要医治他人心灵的痛苦，你必须自己

经受痛苦。”戴安娜不断地点头赞同。

在她寻求一种能够接受的平衡的生活时，她承认她所取得的进步。她说：“我都想好了，我的生活正在发生变化。这仅仅是开始。”

第二章 我应该是个男孩

童年的记忆深深铭刻在她的心灵之中。戴安娜·斯宾塞坐在诺福克郡她家楼前冰凉的石头台阶上，手抓着铁栏杆，看着四周忙乱景象。她能够听到父亲把衣箱放进汽车后箱里的撞击声和母亲弗朗西丝踩在前院砾石路上的嘎吱声。车门砰地关上了，引擎启动了，母亲驱车驶出派克庄园的大门，从她的生活中永远消失了。那时戴安娜只有六岁。半个世纪以后，这个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父母婚姻的破裂给她带来的被遗弃感、不信任感及孤独感时时袭上心头。

她还能记得童年的许多情景：母亲的眼泪、父亲孤独的沉默、保姆的不断更换、父母无休止的唇枪舌战、弟弟查理睡觉前的啜泣声、她未能成为男孩的负罪感以及她是个“令人讨厌的姑娘”的心理，始终萦绕在她的记忆之中。她渴望被拥抱、亲吻。她不要一切物质方面的东西，但感情方面的东西她什么都

要。“她出生在特权阶层家庭，但童年却是不幸的。”她的占星术家弗利克斯·莱尔评论道。

尊贵的戴安娜·斯宾塞生于1961年7月1日下午，是奥尔索普子爵和子爵夫人的第三个女儿。子爵时年三十七岁，子爵夫人比他小十二岁。婴儿体重七磅十二盎司，父亲惊喜异常，因为她简直是个“身体完美的标本”。然而，他的惊喜转瞬即逝，因为新生儿不是全家期待已久的能够继承“斯宾塞”姓氏的男孩。子爵夫妇连女孩的名字都未考虑过。一周之后，他们才为女婴取名“戴安娜·弗朗西丝”，承继子爵夫人和子爵祖上女辈的姓氏。

假若子爵把女儿视为掌上明珠，为她而感到骄傲，他就不会用“身体完美的标本”这样的词语来评价女儿了。十八个月以前，子爵夫人生过一个严重畸型的男孩，起名为约翰，可怜的孩子仅仅活了十个小时。子爵夫人悲痛欲绝，家中长辈人不断施加压力，催促子爵夫人去医院检查，看她生理上“究竟有什么毛病”。他们想知道她为什么接二连三地生女孩。年仅二十三岁的子爵夫人被送到伦敦各种各样的诊所检查身体。对这位高傲、好强、固执的女人来说，这无疑是莫大的羞辱、不公正的待遇。现在看来，生男生女取决于男人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子爵的儿子查理·斯宾塞伯爵评论道：“对我的父母亲来说，那是个可怕的时期，很可能那时就种下了他们离婚的种子，因为我认为他们从未摆脱那个时期留给他们的创伤。”

戴安娜年幼，无法理解家中的事，但她肯定感受到家人沮丧的情绪，并相信她自己是个“令人讨厌的孩子”。她相应产生了一种负罪感，感到自己是个失败者，因为作为女孩，她一出世就令父母和家人失望。

戴安娜三岁时，全家人期待的儿子出世了。当年她是在桑德里格姆教堂施的洗礼，普通的富户人家是她的教父教母，而弟弟查理是在威斯敏斯接受的洗礼，女王担任他的教母。新生男孩将是斯宾塞家遗产及爵位的继承人。虽说家境迅速衰落，但15世纪时祖辈是全欧洲最富有的牧羊商人，积聚的财富仍然相当可观。查理一世时他们就买下了伯爵爵位，在北安普敦郡建造了奥尔索普庄园，收集了一大批古董、书籍、艺术品及文物。

此后的三百年间，斯宾塞家人一直是肯辛顿宫、白金汉宫和威斯敏斯特区的常客，在国家和宫廷的各个部门担任高职。如果说斯宾塞家还未有人登上居高临下的权力顶峰，但他们始终都在权力的通道上奋力攀登。其中有的人享有嘉德勋位，有的担任枢密院顾问官、外交官和英国海军大臣。第三代斯宾塞伯爵曾被认为有可能当选英国首相。斯宾塞家族与查理二世和莫尔伯勒区、德文郡区、艾伯科恩区的公爵甚至包括罗斯福在内的几任美国总统以及电影明星汉弗莱·博加特等人都有血缘关系。

贵人情操理应高尚。一代又一代的斯宾塞人对君主忠心耿耿，诚心效力，其中有人担任宫廷大臣、王室侍从、宫廷女侍和其它职务。戴安娜的祖母斯宾塞伯爵夫人做过伊丽莎白女王和王后的卧室女侍，她的外祖母弗莫伊夫人也做过近三十年的王后卧房女侍，戴安娜的父亲担任过乔治六世和当今女王的男侍。

然而，戴安娜童年住过的房子——派克庄园却是她母亲的祖辈留下的遗产。戴安娜的外祖父莫里斯·弗莫伊与乔治五世的次子约克公爵（后来的乔治六世）关系要好，乔治五世便把派克庄园赠送给他。这座宽敞的住宅原来是供从桑德里格姆庄

园来的客人居住的。

弗莫伊家族在当地享有盛名。莫里斯·弗莫伊是下议院的保守党议员，其妻放弃大有前途的首席钢琴手职业嫁给了他，并创办了金斯林艺术音乐节。自1951年开办以来，该音乐节吸引了大批著名音乐家前来演奏。

对年幼的戴安娜来说，悠久的贵族遗产与其说是动人的，倒不如说是可怕的。她从不喜欢到祖先留下的奥尔索普庄园去。那里面有阴森可怕的角落和昏暗的回廊，悬挂着死去的祖先们的画像。他们威风凛凛，目光令人生畏。戴安娜的弟弟回忆道：“它就像一家老钟表店，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对一个敏感的孩子来说，那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我们从不想到那里去。”

戴安娜的父亲也有同样的感觉。脾气暴躁的祖父、第七代伯爵杰克与儿子约翰尼·奥尔索普关系不和。许多年来，他们从未打过招呼，更不用说谈话了。老杰克有一个“博物馆馆长伯爵”的诨名，因为他对宏大的庄园里的每一幅画像和每一件家具的历史和来龙去脉都了如指掌。他为他的庄园而感到骄傲，经常手拿掸帚尾随在来访者身后。有一次在书房里，他曾随手摘下丘吉尔叼在嘴里的雪茄。这位脾气粗暴的老人具有很高的修养和情操，而他的儿子则自由放任，和蔼可亲，一副英国乡下绅士的派头。

戴安娜敬畏祖父，但十分喜欢祖母斯宾塞伯爵夫人。做了王妃的戴安娜回忆道：“她和蔼善良，不同寻常，是个极好的人。”伯爵夫人在当地很有名气，她经常探访老弱病残的人，给他们以安慰。戴安娜不仅继承了母亲奔放、执拗的个性，也吸收了祖母对他人同情、体贴的品质。

与庄严肃穆的奥尔索普庄园相比，戴安娜童年住过的外祖

母的家——派克庄园则显得温暖、小巧、舒适。尽管它拥有十个房间，还有工作人员住室、车库、室外游泳池、网球场、板球场以及厨师、管家、家庭教师等六位工作人员，但与祖父的家相比，仍有天壤之别。

庄园林荫蔽道，草木丛生，房屋坚固，但它那陈旧肮脏的外观使它显得有些破烂荒凉。斯宾塞家的孩子们尤其喜欢庄园内的杂物堆。

1975年祖父去世以后，他们搬到祖父的家奥尔索普庄园。离开派克庄园时，第七代伯爵查理对每一个房间都说了声再见。时至今日，戴安娜依然对她住过的房子恋恋不舍，经常回去看看，尽管它已变成了残疾人度假的旅馆。

派克庄园是孩子们和谐神奇的家。一楼有青石地板厨房、深绿色的洗衣房、小猫住的屋子以及家庭教师艾伦小姐教他们读书的教室。教室隔壁是孩子们的天地，他们给它起名为“硬壳虫屋”，屋内贴满了幻觉剂广告画和60年代的名星照片。住宅的其它地方与上层社会的家庭相同，到处悬挂着家族成员的画像、照片、题词以及显示家庭成员一生成就的照片和证书。

在二楼奶油色的卧室里，戴安娜临窗眺望，美丽的景色尽收眼底：牛群悠闲自得，田野平坦宽阔，翠绿的草地上点缀着片片白桦木和紫杉木树林，兔子、狐狸及其它林地动物时时可见。窗扉上不时有海风穿过，使人想起诺福克距大海只有六英里之遥。对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这是理想的天地。他们在水池边喂鱼，翻越铁栏杆，牵着长毛狗奔跑，在花园里捉迷藏，倾听海风穿越树林的呼啸声，寻找鸽子蛋。夏天，他们在室外游泳池里游泳，追逐青蛙，去海滩野餐。

戴安娜像两位姐姐一样，三岁时就开始学骑马，不久就对

动物着了迷，动物越小她越喜欢。她拥有的小动物有仓鼠、兔子、豚鼠、猫以及任何能装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每当一个动物死去后，她总要认真地举行葬礼。除金鱼死后被倒进马桶外，对其它死去的动物，她通常把它们装进木质鞋盒里，在草坪的雪花下挖一个坑，让它们在里面安息。最后她还要把墓顶装饰一番。

肃穆的基地对孩子们却有吸引力。查理和戴安娜经常到桑德里格姆教堂的基地去祭奠他们的哥哥约翰。站在坟墓旁，他们想象哥哥的模样，思考着哥哥如果活下来父母会不会再生他们。查理认为姐姐戴安娜出生后，父母不会再生孩子了，而戴安娜本人感到她就是不应该出生的人。这是他俩不断琢磨、至今悬而未解的问题。在戴安娜年幼的头脑里，哥哥的墓碑及墓志铭“爱的纪念”经常使她想到，她是个不该出世的孩子。后来，她常对人说：“我是个女孩，这个女孩应该是个男孩。”

戴安娜的乐趣来自过时的 30 年代的儿童读物，父母对他的抚育也同样反映了过时的价值观念。她有一个出生在肯特郡的保姆，名叫朱迪思·潘内尔。她常常用一个旧童车推着小戴安娜在庄园里转游。事实上，戴安娜的最初记忆就是童车篷的“那股温馨的塑料气味”。这位正在成长的小女孩多么想见见母亲啊，但她很少如愿以偿，更不用说见父亲了。她的两个姐姐莎拉和珍妮，一个比她大六岁，另一个比她大四岁。她出生时，姐姐早已开始在楼下的教室里上课了，等戴安娜长到可以和姐姐玩耍时，她们已经背着书包到寄宿学校上学去了。

一日三餐是和保姆一块吃的，每天都是简单的饮食：早餐是谷类食物，午餐为肉和蔬菜，每周星期五吃鱼。父母的餐桌与他们有一段距离。查理七岁时才在楼下的餐厅与父亲一起用